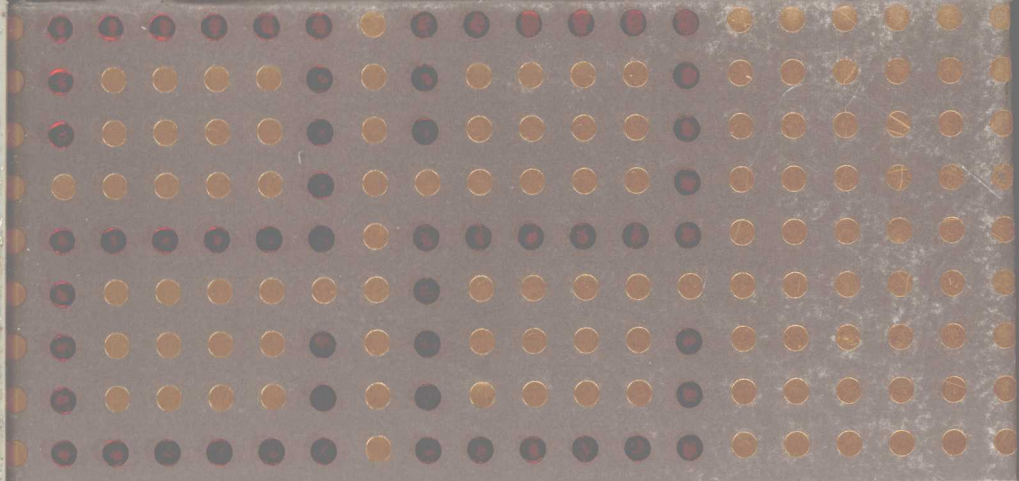




中国新文学大系

1976-2000

第二十二集 诗卷

总主编 王蒙 王元化

本卷主编 谢冕

中国新文学大系 1976—2000

第二十二集

本书编委会 编

总主编 王蒙 王元化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新文学大系 1976—2000 第二十二集. 诗卷 / 谢冕主编
刘福春副主编.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9. 3
ISBN 978-7-5321-3475-5

I. 中… II. ①谢… ②刘… III. ①文学-作品综合集
-中国-当代②诗歌-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20164 号

CHINESE NEW LITERATURE SERIES, 1976—2000

In 30 Volumes

VOLUME II XII: POETRY

Editor-In-Chief: Xie Mian

Deputy Editor-In-Chief: Liu Fuchun

Shanghai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2009

Shanghai, China

本丛书系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资助项目

出品人 郑宗培

责任编辑 徐如麒

封面设计 袁银昌

中国新文学大系 1976—2000 第二十二集

诗卷

总主编 王 蒙 王元化

本卷主编 谢 冕 副主编 刘福春

编辑: 本书编辑委员会

出版、发行: 上海文艺出版社(上海绍兴路 74 号)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金坛古籍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 × 1168 1/32 印张 21.5 插页 6 字数 579,000

2009 年 3 月第 1 版 200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300 册

ISBN 978-7-5321-3475-5/I · 2646

定价: 58.00 元

序 言

谢冕

重新开始的时间

时间开始了。这是胡风的一个诗题。此诗写于 20 世纪 40 年代的最后一年,距本篇文章所述的时间已是半个世纪以前的事了。^① 欢乐的讴歌,真诚的祝愿,憧憬和希望,光荣和梦想,这是那个时代最具代表性的诗意。饱经忧患的中国人,在黎明前的黑暗中眺望黄土高原上初生的一道阳光,用激情的颂歌,迎接了一个新的时代。

① 《时间开始了》是一部系列抒情长诗,胡风作。首章《欢乐颂》,原载 1949 年 11 月 20 日《人民日报》。开头是这样的:

时间开始了

毛泽东

他站到了主席台正中间

他站在地球面上

中国地形正前面

他

屹立着像一尊铜像……

从历史的长河看,这的确是一个新的时间的开始。中国结束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历史,作为一个独立、健全的民族站立在世界的东方,^①这是开天辟地的大转折。革命和建设在新生的土地上进行,一切都是新的。新的一切改变着中国,改变着人民的生活,也决定着人民的命运。

但是,这新开始的时间运行得非常的艰难曲折。有很多的鲜花笑语,也有很多的泪水血污。幸福伴随着苦难,破坏紧追着建设,在这段诗歌史之前,时间是那样地令人珍惜,又是那样地令人惊恐。^②无休止的“革命”和“斗争”,无休止的“改造”和“批判”,使文学和诗歌无所适从。一次又一次的“运动”过去之后,是一批又一批的诗人的“消失”。

最早消失的是以胡风为代表的“七月派”,他们在一场莫须有的“反革命集团”事件中整体地消失。1957年火热的夏天,有一场如火如荼的“反右派斗争”,以艾青为代表的一大批诗人成为这场运动的牺牲品,再次同样整体地消失。再后来,就是震惊世界的“文化大革命”,长达十年之久的狂风暴雨席卷了几乎所有的写作者,对诗歌而言说是“一扫而空”也并不过分。中国已经没有诗歌,^③要是有的,那就是只剩下令人触目惊心的三个字:假、大、空。

这是个欲说还休的年月。叙述这段历史要有足够的耐心和毅力,要忍住那无尽的悲情,要用理性的冷静从乱麻中理出头绪。需

① 上引《欢乐颂》结束于如下这些逐渐短促而有逐渐加强的句式:“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从此站立起来了!”“站立起来了!”正是突出了这种民族历史性“站立”的主题。

② 何其芳写于1952—1954年的《回答》诗中就出现“惊恐”一词:“从什么地方吹来的奇异的风,吹得我的船帆不停地颤动;我的心就是这样被鼓动着,它感到甜蜜,又有一些惊恐。”

③ 1978年1月,邵燕祥写了《中国又有了诗歌》:“还我笔,还我歌喉,我要唱人民的爱憎,革命的恩仇”;1980年,郑敏在香港《秋水》发表《诗呵,我又找到了你》。可见,诗在中国曾经“淹没”和“失踪”。

要赶紧说的是,上边那些文字说到的“消失”,只是属于“成批”和“有形”的一类,并不包括那些零散的和无形的消失,而后者,其数量可能还要数倍于前。在这段诗歌历史开始之前,我们的历史是既欢乐又悲哀的,许多诗人(连同他们的诗)弥散在苍茫的风烟之中。我们只能在历史的夹缝中寻觅那些失落的诗的踪迹。胡风以及和他一样以无保留的热情写过时代的颂歌的诗人,他们也许没有料到,正是他们所歌颂的曾经是辉煌的、后来变成严酷的时间,无情地扼杀了他们的歌唱。

幸好,历史终于翻开了新的一页。1976年的10月,如同当年胡风写《时间开始了》的那个时刻,中国人民终于拥有了一个重新开始的时间。这就是政治家和历史学家通用的“新时期”的开始。而在这个新时期到来之前,中国经历了怎样的一个阵痛啊!那是一个大塌陷、大迸裂、大震荡的年月,更是一个大悲哀孕育着大欢喜的惊心动魄的年月!

1976年是天崩地裂的一年。有一阵巨大的陨石雨袭击了中国的北方,空前的大地震使唐山几乎成为一片废墟,这场地震无情地夺走了数十万生命。1976年1月,周恩来去世。周的去世爆发了天安门前声势浩大的花圈和诗歌的大示威。7月,朱德去世。9月,毛泽东去世。毛的去世引发了全民为之振奋的粉碎“四人帮”的大事件。民间有传言,是天怒人怨,是天塌地陷,是文臣武将,是左膀右臂的摧折!总之,一个时代从此结束了,从此结束了一个让人希望和欢喜又让人失望和悲哀的时代!

中国诗歌没有辜负这激动人心的岁月。《天安门诗抄》记载了人民的抗争和无畏、智慧和勇气。它证实,中国诗人不会在高压和残暴面前沉默。尽管人民手中没有枪炮,但是诗歌遵从了特定时代的要求,成为手无寸铁的人们以正义反抗邪恶的武器。以悼念周恩来的逝世而爆发的“天安门诗歌运动”,撰写了近代以来中国诗歌史最为壮丽的一页——

1976年,当那些喷吐着愤怒的诗篇出现在清明寒冷的雨雾中时,人们只是为大体是古老的传统体式中挟带的雷电所震慑。那是血与火铸就的斩魔的诗剑。这当然意味着诗歌人民性传统的恢复。然而,它并不意味着其他,特别不意味着诗歌艺术的复苏乃至全面的创新。但是,无可置疑的是,天安门前那呼啸的烈焰,点燃了一个诗歌新时代。^①

中国在等待。等待随着政治形势的改变而导致的文学艺术(包括诗歌)的大变革。当然,从这里到那里,从这点到那点,从一个结束到另一个开始,这个过程不仅漫长而且充满艰险。中国是在阵痛中,中国在孕育着一个新的诞生。随后的年月所发生的一切事实,都在说明这个古老民族的积重有多深,前进的路上、特别是艺术和诗歌想要在旧有的陈式中突围的路上,所将遭遇的艰难险阻,是世界其他地方的人们所难以想象的。

一连串重大的政治事件造成了决定中国命运的历史大转折。在意识形态支配一切的年代,诗歌和文学的繁盛往往受制于政治的脉动。黑暗与光明际会的时刻,人们习惯地挑选他们熟练的诗歌方式来表达他们的激情。政治抒情诗于是顺理成章地成为了人民喷发热情的恰当的形式。这个时期是政治抒情诗的多产年月,出现了李瑛的《一月的哀思》、柯岩的《周总理,你在哪里?》、贺敬之的《中国的十月》、光未然的《革命人民的盛大节日》等一系列脍炙人口的名篇。

政治抒情诗是政治意识高扬年代的产物。它以重大的政治事件为题材,以激昂、热烈、奔腾的气势,传达集体人群的共同情绪。

① 谢冕:《中国最年轻的声音》。引自《谢冕文学评论选》第132页,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4月。

政治抒情诗杜绝非群体性的情感,在那里,诗人充当了代言的先知,诗人是群情的引领者,诗人的歌颂之声往往是国家意识的一种传导。政治抒情诗的主人公是确定的,那就是虽然显得抽象却又不产生歧义的“人民”。诗歌的作者以他们的写作体现了“大我”的愿望和情怀而引以为豪。

全民政治情绪高昂的年代,适宜于宏大的叙事和群众性的场合,长篇政治抒情诗往往成为最富于鼓动性的方式。它适宜于传达和表现政治对于诗歌的整体期待:借此以呼唤和传递对于重大政治事件的热情。在 20 世纪后半叶的大量的群众性场合,政治抒情诗充当了宣传员和鼓动员的角色。郭小川和贺敬之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1976 年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再次激起了人们的政治热情,政治抒情诗理所当然地再次充当了传导和抒发这种激情的手段。遗憾的是,杰出的诗人郭小川没能为此贡献出他的诗篇,他在黑暗已经过去、曙光刚刚来临的时刻,告别了他所深爱的土地和人民。

一个旧的时代正在过去,一个新的时代正在诞生。对于诗歌而言,一个以群体的意志为主导的“集体抒情”的时代正在过去,经过一番激烈而痛苦的蜕变,以普遍的人性和受到尊重的主体性的诗歌实践,正在逐渐地取代业已定型的创作模式。从这里往后叙述的文字,是一个崭新的开始:一个真正体现了时代精神并充分张扬个性的诗歌,正以自由、开放的姿态书写着中国诗歌史新的篇章。

悲喜交集的归来

时间是最公正的,时间将清算历史的错误,并调整社会行进的方向。“文革”动乱的结束,意味着新的时间的开始。百废待兴,首先是给那些受到错误待遇的生者和死者昭雪平反。被迫的流亡者和逃亡者的归来,是这一时期中国社会(包括中国的诗歌)最为动

人的一道风景。长达数十年的先后的离散,人们哀悼那些无辜的死者,庆幸自己还能看到天空晴朗的一天,尽管带着心灵和肉体的累累伤痕,^①但还是真情地感谢着重新开始的时间。

艾青的复出是这批归来者中最具象征意义的一个事件。1978年4月3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艾青的《红旗》^②。这首诗新意不多,但体现了艾青一贯的清新明朗的风格。而它的出现这一事实所传达的意义,也许超过了诗的本身。至少在艾青这里,它表达的是,尽管历尽折磨,作为诗人,心依旧,诗也依旧;而对于中国诗歌界,则是一声响亮的宣告,中国终于又有了诗歌!

艾青把他复出之后的第一本诗集取名《归来的歌》,这名字有很强的历史感,它概括了整整一代中国诗人的命运。擦干身上的血泪和污秽,在新的时间里讲述灾难岁月的往事,讲一条活生生的鱼怎样变成了化石;讲一棵树怎样被奇异的风吹到了悬崖边上;讲滴血的趾爪在水泥墙上留下血淋淋沟壑的华南虎。^③在这些带着愤怒的含泪的叙述中,我们发现了一直受到轻忽和否定的、久违的“个人”,个人的命运因苦难的叙述而得到呈现。

在中国新诗的历史中,“个人”(更多的时候被指称为“个人主义”)一直是非常敏感的话题,它是一种与“集体”相对立的存在。

① 以艾青的一段经历为例,可以看到那些被流放的诗人的一般遭遇。[俄]R. E. 切尔卡斯基这样叙述说:“他们住的地方没有床,五年多都睡到地窝子地上,睡在没有阳光、没有电灯的黑暗之中,在那里他的右眼失明了”,“艾青当了打扫厕所的‘清洁工’。……艾青已经是快六十岁的人了,但是为了老实‘改造’,他还得天天去打扫厕所:夏天,天气炎热,臭气逼人;冬天,寒风刺骨,破冰掏大便。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见切尔卡斯基《艾青:太阳的使者》(宋绍香译),第176页,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年1月。

② 原文是:“火是红的,血是红的,山丹丹是红的,初升的太阳是红的;最美的是在前进中迎风飘扬的红旗!”

③ 这里分别指艾青的《鱼化石》、曾卓的《悬崖边的树》和牛汉的《华南虎》诗中的意象。

前者总是渺小的和罪恶的,而后者总是伟大的和崇高的。理论肯定后者而贬抑前者,于是形成了中国诗中长时间的“忘我”或“无我”的状态。诗歌的“归来”首先是“个人”的归来。特定时期的社会悲剧,引发了普通人的命运沧桑的感慨。控诉和批判残暴的结果,无意间却凸显了对于个体生命的关注和尊重。当然这种关注和尊重并未超越社会谴责的层面。

但不论如何,这是归来者对于中国新诗史的意外的贡献。中国的诗人终于有机会在社会的失序和异常的背景下来谈论一己的悲欢了。我们因诗人的叙述而认识了中国历史的重负,以及底层的无助与受难。诗到底是立足于个人的情感体验,只有对于生命过程的真实体悟,他方可抵达众生。归来的诗不仅让我们认识了诗人的蒙难,而且通过它还深刻地认识了中国社会的痼疾。

动乱结束,人们感慨唏嘘面对久违的一切,有一种梦一般的被埋葬的感觉。老友相对,彼此打趣是“出土文物”。“归来”的诗意对掩埋和发掘的主题非常敏感,除了被掩埋的化石,还有钻石:一种是对失去的岁月的怀念,一种是对顽强的生命的赞赏。世事的变迁常有异兆,那年华北某地常林乡民种地发现巨大的钻石,“常林钻石”于是成为抒发被掩埋与重新发现的情感的媒介。“不知道有多少亿年 被深深地埋在地里 存在等于不存在 连希望都被窒息”——艾青的诗讲发现者和被发现者一刹那的相遇:“两种光互相对照 惊叹对方的美丽”。^①

与此类同,贝壳和珍珠的意象也受到诗人的钟爱。贝壳是离开大海的生命,寄托了这些幸存者悲哀的记忆。而贝壳中那些柔软的肉体,经历过痛苦的磨砺,却铸就了闪光的珍珠。所以,蔡其矫说珍珠是“贝的创伤”,是“痛苦的结晶、海的泪”。流沙河是一写、再写

① 艾青:《互相被发现——题“常林钻石”》。蔡其矫和流沙河也都以常林钻石为题写过诗。

贝壳。艾青写《虎斑贝》：“在绝望的海底多少年 在万顷波涛中打滚 一身是玉石的盔甲 保护着最易受伤的生命”。这写都是诗人对于生命的自我陈述。

是苦难的经历给过去贫瘠的诗歌注入了这么多新鲜的元素。在以往,因为只被允许“乐观向上”而显得异常单调的诗歌,一下子因涌进了这么多的悲怆和惨烈,而猛然变得空前地丰富起来,这真是应了“国家不幸诗家幸”这句话了。社会的动荡,家庭的离散,命运的惨痛,诸多因素的融合,归来的诗歌给中国新诗带来了意外的收获,这就是变贫乏为富足。

这些在各个时期离散的诗人的聚合,使被极左路线割断了的新诗传统得以恢复。宽容而公正的时间改正了历史的歧误,归来的诗人回归了接续了新诗的五四传统。他们的归来终止了对于新诗无休止的破坏,归来者的贡献在于新诗的建设。许多带着累累伤痕的归来者,都满怀希望地迎接了新的文艺复兴的春天。他们希望在新的历史时期创作上有一个新的开端,包括在艰苦岁月中九死一生的穆旦。^① 陈敬容的诗句最能代表这批归来者的不老的诗心:

怎能说我们就已经
老去? 老去的
是时间,不是我们!
我们本该是时间的主人。^②

① 1976年12月29日,穆旦给好友杜运燮写信,鼓励杜要像春蚕吐丝那样写作:“何况你没有到那种时候,可就不吐丝了,多么可惜!对我说,是要和者多一些,减少寂寞之感。现在你可坐在家里弄文件的翻译(一种糊口活),条件是便于弄诗,我倒希望你不止是这一首。调子回到从前的,取消了你上次写的那种民歌加旧诗的词句,这是我觉得可喜的一点。思路也开展些,不过也有些 truism,如: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大干的冬天,之类。主要的在于太说理,忘了形象的完整;说理多则动人少。”李方:《挚友心语》,《诗探索》,2006年第3辑,第88页,时代文艺出版社,2006年12月。

② 陈敬容:《老去的是时间》。此诗作于1979年3月14日。

20 世纪 80 年代是新诗伟大复兴的年代,伴随着随后就要谈到的新诗潮的崛起,也伴随着更加激烈的“朦胧诗”大论战,新诗摔掉了昔日的噩梦,进入了可与五四相比美的相对自由、宽松的建设时期。这里所谓的建设,并不单指创作的繁荣,还有对于新诗历史的延续和修复以及大量的拨乱反正的工作。80 年代最初两年,《九叶集》和《白色花》^①两部诗选的编辑出版,是最有建设性的事件。

《九叶集》的作者们郑重重申诗是现实生活的反映的理念,但又有他们的一贯的强调和解释:“这个生活既包括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重大题材,也包括生活在具体现实中人们的思想感情的大小波澜,范围是极为广阔的,内容是极为丰富的;诗人不能满足于表面现象的描绘,而更要写出时代精神和本质来,同时又要求个人情感和人民情感的沟通。”^②作为一个诗歌群体,“九叶”诗人除了具有深厚的中国诗歌传统之外,他们的西学基础同样深厚,特别是不同程度地具有鲜明的现代主义倾向。20 世纪 40 年代后半期,这些诗人在当时时尚的文学潮流中是一个异数,他们长期受压制和被歧视。时代走向清明,“九叶”在新时期的阳光下伸展着浓郁的春意。后来,他们作为现代诗的前辈成为“朦胧诗”最有力的支持者。

集结在《白色花》旗帜下的诗人,是一批受到胡风影响并多少与之有联系的诗人。^③他们也有自己的诗歌信仰和追求。他们努

① 《九叶集》,收辛笛、陈敬容、杜运燮、杭约赫、郑敏、唐祈、唐湜、袁可嘉、穆旦九人诗作。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1 年 7 月出版。《白色花》绿原、牛汉编。此书收阿垅、鲁藜、孙铤、彭燕郊、方然、冀方、钟瑄、郑思、曾卓、杜谷、绿原、胡征、芦甸、徐放、牛汉、鲁煤、化铁、朱健、朱谷怀、罗洛等二十人诗作。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年 8 月出版。

② 袁可嘉:《九叶集·序》。出版见前注。

③ 绿原在《白色花·序》中说:“胡风先生作为文艺理论家,他对于诗的敏感和卓识,以及他作为刊物《七月》、《希望》编者所表现的热忱和组织能力,对于这个流派的形成和壮大起了不容抹杀的诱导作用。”见《白色花》第 3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年 8 月。

力把“诗和人联系起来,把诗所体现的美学上的斗争和人的社会职责和战斗任务结合起来”,他们强调诗人的自我意识:“诗的主人公正是诗人自己,诗人自己的性格在诗中必须坚定如磐石,弹跃如心脏,一切客观素材都必须以此为基础,以此为转机而后化为诗。”^①这是一群和前述《九叶集》的诗人们艺术追求各有尊崇的诗人,他们因胡风一案的牵连多少受了磨难,但他们代表了中国诗歌的正气和良心,他们无愧于历史。绿原在《自色花》序言的最后说了如下沉痛的话——

本集题名《白色花》,系借自诗人阿垅 1944 年的一节诗句:

要开作一枝白色花——

因为我要作这样宣告,我们无罪,然后我们凋谢。

如果同意颜色的政治属性不过是人为的,那么从科学意义上说,白色正是把自己身上的阳光全部反射出来的一种颜色。作者们愿意借用这个素净的名称,来纪念过去的一段遭遇;我们曾经为诗受难,然而我们无罪!^②

新时期酝酿着一场气势壮阔的诗歌复兴。在这个高潮到来之前,这批满身伤痕累累的归来者的劫后重逢,成为了动人心弦的前奏。他们以动乱惨烈时代中的个人血泪经历,谱写了中国新诗最真实的一页。他们又以与五四新诗传统对接的艺术经验弥合了惊人的文化断裂。他们以自己创作实绩结束了丑陋的由谎言和虚情充填的历史。归来者血迹斑斑的脚印,画出了中国新诗的一道希望

① 绿原:《白色花·序》。《白色花》第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8月。

② 同前注,第9页。

的彩虹。

在新的崛起面前

自 20 世纪 40 年代以来,由于中国始终处于危急的战争环境中,特殊的形势决定了中国文艺选择了特殊的道路。日益严酷的内忧外患使一切都服从于生存的需要,不断推进诗歌和一切文学艺术的“革命化”,是此时中国唯一的可能选择。在一种庄严的承诺下,以“革命”的名义,对文学和诗歌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旷日持久的“一体化”的改造。新诗“一体化”的工作取得了空前的成效,五四时期那种个性各异的自由创造的流韵,已被荡涤殆尽。在“文革”结束之前,我们面对的只有一种从内容到形式都高度一致的诗歌。这是新时期到来之前的诗歌事实。新诗的一体化以诗歌的陷于绝境为代价。新诗走着一条愈走愈窄的险径。

但是,冰雪覆盖着春天的希望。就在“文革”最混乱的那些年月,处于绝望的诗歌正在孕育着新的萌动。早在“文革”如火如荼的年代,社会上焚书毁乐的疯狂行动正在肆无忌惮地进行着,与此同时,相当多的知识者、特别是上山下乡的知青群体,已经悄悄地掀起了地下阅读的行动。除了内部出版的灰皮书、黄皮书^①之外,知青自行油印或手抄的地下读物,也在悄悄地传播。

早在 60 年代初叶,北大和周边的学校一些思想激进的诗歌爱

① 萧萧在《书的轨迹:一部精神阅读史》中说:“一位在河北白洋淀地区插队的原北大异端思想‘共产青年社’读书圈子成员后来回忆道:‘那时,我们狂热地搜寻‘文革’前出版的灰皮书和黄皮书;我的一个初中同学的父亲是位著名作家,曾任文艺部门的领导,我在她家里发现了数量颇丰的一批黄皮书,记得当时最有启蒙意义的书是爱伦堡的《人·岁月·生活》。’见廖亦武主编《沉沦的圣殿》,第 11 页,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99 年 4 月。

好者,已有类似诗歌群体的结社出现。^① 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遍布知青群落的各个角落,其中尤以北京知青聚居的白洋淀最为知名。^② 在新诗潮涌起之前,人们对已有诗歌秩序的厌恶以及对未来新诗的期盼,已是坚冰下面的潮涌,过渡期以自己的方式给人们以信心和希望。作为朦胧诗的先驱,前述那些地下诗歌社团的活动为新诗潮提供了有力的准备。宥于当时特殊的社会环境,那些诗歌作品多以传抄或自印等方式流传。

作为准备期的诗人之一,黄翔的写作起始于60年代。写有《独唱》:“我是谁,我是瀑布的孤魂 一首永远离群索居的诗。我的漂泊歌声是梦的游踪,我的唯一的听众是沉寂。”他的这些早期的写作已经显示出与当日主流诗歌的巨大差异。他的《野兽》,也是一篇狂野不羁的咒语,诗人自况是一只被追捕的野兽,也是一只被野兽践踏的野兽,“即使我只仅仅剩下一根骨头,我也要哽住我的可憎年代的咽喉”(1968)。黄翔的诗秘密写作在异常的年代,后来以“启蒙社”的名义自印发表。他的诗表达了对这些年代的诅咒和憎恶。黄翔承继了新诗的浪漫激情,他的长篇抒情诗《火神交响曲》点亮了黑暗年代的希望的火光。

同样的时代,相似的年龄和经历,另一位诞生在战争环境中的

① 参阅牟敦白《X诗社与郭世英之死》及张郎郎《“太阳纵队”传说及其他》,见廖亦武《沉沦的圣殿》,出处同第11页注1。陈超在《“X小组”和“太阳纵队”:三位先驱诗人——郭世英、张鹤慈、张郎郎诗歌论》中亦有论述,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4月。

② 多多《被埋葬的中国诗人(1972—1978)》:“芒克是个自然诗人,我们十六岁同乘一辆马车来到白洋淀。白洋淀是个藏龙卧虎之地,历来有强悍人性之称,我在那里度过六年,岳重三年,芒克七年,我们没有预料到这是一个摇篮。当时白洋淀写诗的人,如宋海泉、方含。以后北岛、江河、甘铁生等许多诗人也都往那里游历。”“1973年以后的诗人就多了。史保嘉、马佳、杨桦、鲁燕生、彭刚、鲁双芹、严力等等。其间我还见到了更老一辈的牟敦白,他和甘恢里、张郎郎一代,属于从60年代就开始艺术活动的。”同上注第199页。

诗人食指(原名郭路生^①),也是准备期的有影响的诗人。黄翔以野兽自况,食指则自比疯狗:“受够无情的戏弄之后,我不再把自己当成人看,仿佛我成了一条疯狗,漫无目的地游荡人间。……假如我真的成一条疯狗,就能挣脱这无形的锁链,那么我将毫不迟疑地放弃所谓神圣的人权。”关于这首题为《疯狗》的诗,有人评论指出,“在食指这里,遍体鳞伤的悲歌中也含有彻骨的冷傲,而且,这种冷傲不是疯狂者的亢奋呐喊,而是在绝境中至为清醒的自我获启”。^②他的《鱼儿三部曲》以陷于绝境的鱼儿控诉了黑暗的年代;他以撕心裂肺的《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记述了动乱时代最惨烈的一幕生离死别:

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
一片手的波浪翻动
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
一声尖厉的汽笛长鸣
北京车站高大的建筑
突然一阵剧烈的抖动
我吃惊地望着窗外
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的心骤然一阵疼痛,一定是
妈妈缀扣子的针线穿透了心胸
这时,我的心变成了一只风筝
风筝的绳线就在妈妈的手中

① 林莽《并未被埋葬的诗人》:“食指生于新中国诞生的前夜。1948年11月母亲在行军路上分娩,故取名郭路生。”同第11页注1第109页。

② 陈超:《冰雪之路上巨大的独轮车》。见《中国先锋诗歌论》第14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4月。

食指的诗在知青中广泛地得到传播。^① 评论指出：“郭路生的诗歌所体现出的强烈而健康的平民风格，使他能够闪电般炫目地突破 X 诗社和太阳纵队的求索者们极其狭窄的青年贵族圈子，楔入时代，以“文革”中特有的手抄本文学的形式广为流传。……郭路生的可贵之处在于他把一种狂飙突进的启蒙意识融入了中国人所熟悉的传统形式，他的诗节奏铿锵易于朗诵仅从皮肤表面就能使人感触到血管。”^② 食指的诗歌在没有诗歌的年代点燃了一代人内心深处诗的火种，在新诗潮出现之前，他是一位启蒙者。他的诗继承了中国新诗理想精神，他成为了连接传统诗歌与新诗潮之间的一座桥梁。

诗歌的转机是伟大的时代赋予的。正如中国社会的转机最后总决定于政治因素一样，事情还是要追究到地动山摇的 1976 年，正是那一场殊死的政治决战，引发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的到来，也引发了中国文学和诗歌的新时代的到来。作为新诗历史的新的一页的象征性事件，其标志是由于一份名为《今天》的刊物的出现。说来凑巧 1978 年中国开了一个决定命运的会议，《今天》的诞生也是这一年。^③

① 一位当年和郭路生在一起的知青回忆说：“郭路生的名声和诗歌很快传遍了方圆百里，附近的公社及大队的北京知青纷纷来拜见诗人，和他谈诗，使我们的杏花村快成了诗圣朝拜地了。……郭路生的诗很快如春雷般传遍了全国有知青插队的地方。他的诗不但在陕西内蒙广为传抄，还传到黑龙江兵团。于是，不断有人给郭路生写信。有索诗的，有谈诗的，有对诗的，更有崇拜他的女性写信求爱并寄来照片的。”戈小丽：《郭路生在杏花村》。同第 11 页注 1，第 68 页。

② 廖亦武：《沉沦的圣殿》第二章《平民诗人郭路生》引言。见该书第 53—55 页，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99 年 4 月。

③ 北岛于 1992 年 6 月 6 日在伦敦大学的“中国当代诗歌研讨会”上接受采访时说：“我想当时整个的背景，可能很多人已经知道了。《今天》一共出版了 9 期，从 1978 年 12 月到 1980 年的 12 月，实际整整两年。以后我们就赶紧地成立了‘今天文学研究会’。9 月份成立，当然进行了一次民主选举，选出文学研究会的编委。所以 9 月份到 12 月份之间又出了 3 期文学资料。另外，我们组织了两次比较大型的朗诵会，在 1979 年的 4 月 8 号和 1979 年 10 月 21 号，这两次朗诵会也可以说是 1949 年以后唯一的。”刘洪彬整理：《北岛访谈录》。见《沉沦的圣殿》第 334 页。